

到呼兰去看萧红

■夏海豹

来到北国冰城哈尔滨，心心念念的是平素爱读的《呼兰河传》和一直心向往之的萧红故乡。我们从哈尔滨市北上不到一小时车程，便见到了呼兰河，河面很宽，水流很大，听出租车司机讲，前几天松花江刚刚发过大水，呼兰河也涨得厉害，黄汤似的河水都漫过了岸边树林的梢头呢。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荣，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路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这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以简练生动的文笔描绘民国初年呼兰县城的景色，她把故乡春天的花朵和蝴蝶，夏天的虫鸣和火烧云，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麻雀和飞雪，巧妙地融入苦难辛酸而又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描摹出了一幅娓娓动听的北国画卷。而从松花江丰满的母体上又分散出许多纤细的支流，这条名叫呼兰河的小河旁边就座落着这座名叫呼兰的小县城，周围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大平原。萧红就是从呼兰河出发的，这位具有传奇的人生和情感经历的女作家，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漂泊，命运多舛，情路坎坷，英年早逝，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洛神”。如今，萧红已是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了。

相比于车水马龙的哈尔滨市区来说有点落寞的呼兰县城（现已改成市辖区），在热力还十分猛烈的秋阳下，闹中取静，只见一座普普通通的北方庭院默默地静卧在呼兰河畔的松北平原上。出乎意料，如今被装修一新的萧红故居竟有7000多平方米，我们走进大门，迎面一尊汉白玉雕像：一位穿旗袍的女子坐在大石上，手背托着下巴，似乎在沉思，座基上写着“女作家萧红1911—1942”。故居分东、西两院，东院还有一处近2000平方米的菜园，即萧红在她小说里描述的后花园，她的童年、青少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户人家。不知道故居现在的布局是不是原有的陈设，但那绿意盎然的菜圃、古朴的水井和北方农家的家具物件，还蛮蜜多，有关萧红生平的文字、图片和著作倒也齐备。

其实，这座今天也不算热闹、游人寥寥无几的故居里并没有所谓的“萧红”，这里只有一个原名叫张乃莹的小姑娘，16岁时张乃莹告别了寂寞闭塞的故乡，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萧红只活了31岁，文学创作历程也不足十年，且多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岁月中进行的，她却克服了心灵和情感的伤痛、贫饥和病痛的困扰，创作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为文坛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她的一生都在逃避命运的捉弄。先是逃避父亲的包办婚姻而与哈尔滨大学的学生李先生私奔，继而为逃避李先生的妻室又与原先订婚的汪公子同居。后又为逃避汪公子而穷困潦倒被萧军救出，再而为逃避萧军的不可容忍的暴躁性格而流亡各地。最终与端木蕻良相遇，又为逃避日本人的轰炸而辗转香港。最后当她什么都不能逃避的时候，死神攫住了她。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沦陷后的香港，葬于浅水湾，可谓“叶落他乡难酬”。人们不禁感叹，天涯孤女，红颜薄命，空负了满腹才情！

我站在正对着大门的萧红塑像前，注视着这位悄然静坐、书册在手、凝望远方的女子，思绪飞扬，哀伤莫名，她在眺望什么呢？萧红的一生都在追求着爱、温暖、自由和幸福，但却一直得不到命运的青睐，不仅童年充满着寂寞荒凉的回忆，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屡屡受挫。作为叛逆的“五四”儿女，作为一个弱女子，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抗争。我们在同情她的不幸时，更钦佩于她的不屈服，这也是她打动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感受可以借用萧红的一首诗来描述：“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因为天色已晚，马上要关门闭馆了，工作人员对我们喋喋不休地进行催促，于是，我们就匆匆地在里面逛了一大圈，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购买了几本书，就默默地离开了。当我走出萧红故居，再次回望安详静坐的萧红塑像时，觉得她就如北方原野上一株无拘无束、自在随性长的小花草，经过岁月的淘洗，已经完全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了。相对于她生前的凄凉命运，所谓的身后之名以及后人打造的故居、纪念馆对于她又有何用呢？当下一阵悲怆的心绪涌上了心头。

■金春妙

单位是土壤，单位里的人是种子，每粒种子最后长成怎样，除了自身的质量好坏之外，土壤对种子的滋养不言而喻。我很庆幸，在那段艰苦的青春岁月，处在社会边缘的单位以冷峻的幽默激发了我们绵延不息的奋斗精神。

我刚入职的单位聋哑学校（即特教中心）坐落在万松山脚下。教学楼、宿舍、食堂，三座小楼，依着地势勾连镶嵌，充分利用边边角角的空地，小巧中带着温馨。我们欢声笑语走出校门，学校旁边钢铁市场的闲人就像发现惊天秘密：“啧啧，哑佬学校的老师会讲话的嘛。”这些话侵蚀着我们的自信，当有人再打听单位时，我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改变他人的偏见就只有改变自己咯。我们的倪校长却会用幽默化解尴尬。有一次坐三轮车，车夫问倪校长去什么地方？他答，去“不会讲”的地方。车夫半天不知所指。我们大笑。倪校长不时蹦出的冷幽默调剂我们枯燥压抑的生活。

传达室老伯寡言少语，老伴却是个爱唠叨的妇人，她咪了一点烧酒，开始讲一些乡间秘史，讲到激昂处，皴裂起皱的大手在空中挥舞，露出缠着红丝线的金戒指。倪校长见了就说，阿嬷，你的手指戴满了真戒指，别人都觉得是假的，飞云的手指戴个假戒指，人家都以为是真的（飞云是我们学校的美女）。倪校长的幽默暗含世态凉薄、以貌取人的调侃。

学校老师被世人低看毋庸置疑，倪校长也不例外。身为直属学校校长，被冠以“聋哑”的定语后，除了我们，社会上的人谁拿他当校长呢？不过他的心态很好。他说，别看我们是“聋哑老师”，可我们归教育局直属管理，我们的年轻老师派到下面学校，当个教导主任绰绰有余。事实果然如他所说，



我们这群在贫瘠土地生长的植物，不断向下扎根，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学校被撤并后，年轻老师分流到各重点学校，逸、蔓、平、新、秀、洁等成为业务骨干，皓、翠、蕾三人更是当上了副校长。

蕾在特教期间，曾全国巡演过小品《一媳三婆》，颜值才艺双在线，是小城家喻户晓的“角儿”。巡演结束，蕾洗净铅华呈素姿，专心教学，为学校争得不少荣誉。有一次我写了篇散文诗，蕾找电台朗读配音，排成舞蹈。演出那天，我们用肢体语言表现聋哑学校老师心理历程：失落、抗争、奋进、超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舞台效果，连参赛的瑞中老师都为我们鼓掌。谁会想到，若干年后我入职瑞中，和当初为我们鼓掌的老师成为同事。

很多人误以为教聋哑学生的老师上课不用说话。其实恰恰相反，我们不仅要讲，而且手和嘴巴同时讲，旨在培养学生读懂手语和唇语能力，为回归主流社会做准备。这些技能，在我离开聋哑学校到外国语学校后，成为一项特长寄存我身上，依然“有用武之地”。某年瑞安市召开少代会，我带领学生在开幕式上领手语操。某次我参加全市班主任基

本功大赛，在才艺展示环节，手语演绎的歌曲《隐形的翅膀》力挫群雄，夺得金奖。我想，特教生涯带给我不被世人理解的同时，也磨砺出我坚韧的性格，无论做什么事，一旦去做，不管多难都要做成。

特教的同事，以自己的亲历生活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箴言。绵举家迁到杭州，以一个中师的起点读出了硕士文凭。朱老师退休返聘回校，为特教事业继续发挥余热。生活老师荣妹妹，除管理好学生，还兼任居委主任，她声音洪亮，笑声朗朗，所到之处春暖花开。食堂帮厨阿川家境贫寒，经多方寻觅才在学校那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宿舍完成结婚生子大事，然而他的儿子是尘埃里开出的一朵美丽的花，先是考进瑞中，三年后又考入北京某211大学。聋哑人建胜是一名体育老师，他钻研苦练体育、摄影、美术等，自学成才。他写的美术字堪称印刷体，他的摄影作品获奖无数，他带的运动队成绩傲人。学校几经搬迁，如果没有建胜，很多档案可能早没了，他像一个老管家一样，守护着学校的老物件。

还有很多老师，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单位里的人和事离开之后才慢慢品出它的好来。时间是试金石，你若不自轻、自贱，总能找到自己的光芒。这些年，在街头巷尾偶尔碰到我的聋哑学生们，或摆着一个饺子摊，或守着一片茶饮店，在烟火漫卷处，靠自己的双手谋生。这让我欣慰：人生最美好的一段青春献给特教，值！



老蔡的上望往事

■李浙平

2015年夏日某个中午，我接到瑞安日报编辑的电话，约我和爱好写乡土类文章的蔡桂顺见面，谈一些文章插图的事。

老蔡的个子矮墩墩，如果不是戴了眼镜，就看他络腮胡子拉碴和手臂肌肉结实的样子，便以为他是干体力活的，与教书先生的范儿不搭边。随着老蔡的叙述，我如在翻看一册册充满世俗趣味的囡儿书，俱是青少年耍闹的画面。我听得津津有味，在那些陈年的上望往事画面里，仿佛也有我的影子呢。

老蔡曾谦逊地表示，自己所写的东西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故事。而我当时的体会，恰恰是人生时空的这些片刻、零碎旧事，构成人对往事的永恒记忆，因为这其中不仅有个人生活的痕迹、成长的觉醒、对生存意义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一个已然消逝的年代中现实生活的状态与酸甜苦辣的滋味，让我们永远怀念脚下这片故乡的芬芳和劳作在这片大地上的先辈、父母与亲情友谊。我对于《上望往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当他颇为忸怩地问我能否为他的《上望往事》画些插图时，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应诺下来。

我在浏览《上望往事》时，并没有惊讶于文章的构思，因为这些内容都是他少年时的亲身经历，是不掺虚构意图的原生态乡土情怀回忆录。我也不在意他这些文章在叙述中的结构，在这些看似报流水账式的描述中，真实地保留了往事发生的起因、过程与结果，能够将读者带入作者的心灵感受。我更没关注他对瑞安方言词汇应用的准确程度，因为凭着自己对方言熟悉的读音与句义的理解，还是能够于中感受到地域环境中



方言应用的生活情味。通过细读，我找到插图内容的切入点。

给文章画插图，是一个片段，或者只是一个过程中的点，它只能从连贯的叙述中摘取一个典型的描述，然后绘成一幅比较能体现句子场景和人物状况的画面。那么，《上望往事》的系列作品中，相互之间可为画作的共性是什么呢？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反复阅读，我发现老蔡的这些往事中，小伙伴之间的顽皮是这系列文章的共有特点。这些顽皮包含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生活中的捣乱、戏耍中的恐惧、做坏事后的逃离、惹大人生气、想方设法捉弄别人、对问题的认识自以为是的，甚而对异性的排斥和排斥过程的性朦胧，这些不都是每个人年少时经历过的吗？在《上望往事》中，读者能够通过作者的叙述产生

对自己往事的联想，我以为就在于我们都曾经顽皮过。

顽皮的人物，是《上望往事》的主角，也是丰富了上望往事精彩生活的基础要素之一。在《上望往事》中，除了老蔡本人的旧事，像强仔、老头儿、鼻涕塌、吊眼皮、棉仔、眯眼、冬瓜、冬鸡、红鼻头等等拥有绰号的人物的旧事，是往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顽皮作为，让我们看到上望这一乡村土地上的精神热闹与不屈的生命力。正因为老蔡与这些人物的共同旧事，使《上望往事》由个人的旧事记录提升为一个时代里农村少年的生活缩影。这种提升中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未来保留下一份农村生活真实的物态行为与精神痕迹。相对于当下青少年的生活，应该说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生活乐趣更加丰富与自由，这难道不是当下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青少年快乐成长的氛围吗？

七年前，我依诺为《上望往事》画了插图，并一直期待《上望往事》的刊印。我始终认为在时下众多刊印书籍中，缺少（或不是很多）的正是这类题材的读物，尤其是供青少年课外学习的读物，都太成人化了，能够让当今的青少年了解过去少年的生活，去体会父辈们曾经如何地生活，对于成长应当是有益的。

《上望往事》里的旧事，作为一个局部地域的乡土文学现象，它通过对一种局部地域传统生活与百姓精神的真实描述，更大意义的是将口传文化（说故事）变成文学性的意识形态，无疑是对当下乡土文学创作的一次觉醒。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我个人对乡土文学繁荣的一种期待吧。

公益广告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 讲文明 树新风 ·

